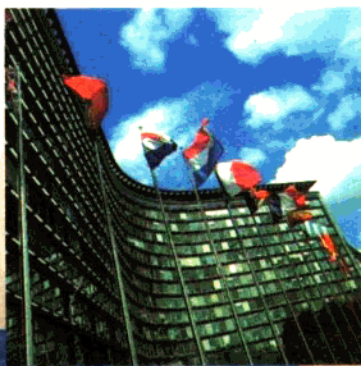


跨世纪国际风云丛书
主编 张永桃

国际体系研究： 历史与现状

李滨

南京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国际风云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张永桃

副主编 时殷弘 严 强 时惠荣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天石 张小明 张永桃 严 强

时惠荣 时殷弘 童 星

序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

张永桃

在今天,无论是居住在非洲热带丛林里刚刚开化部落中的人们,还是生活在像纽约、东京这类现代化大都市中的居民,他们都强烈地感受到世界是联成一个整体的。在政治生活中,除了民族国家以外,一个超越单个国家之上的政治共同体正在西欧发展起来;在经济领域,一个商品和劳务的世界市场正在取代一个个相对孤立的民族市场,各国的贸易、金融正在一体化而进入真正的全球体系之中,大量的跨国公司正在从全球范围内高度配置资源;在文化领域中,世界上的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东正教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正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我们都强烈地感受到,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几十亿人、180多个国家、数千个民族都休养生息、生存发展在同一个“地球村”中。

在人类的历史上,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自然条件的束缚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一个漫长的时间中是相互隔离的。尽管在封建社会中,东西方也有少数几个大国曾经与周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了通商关系,但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旧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世界市场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生活和国际关系。

但是,以往的国际生活、国际关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纷繁复杂,动荡不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内部的发展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在 200 年前,一个亚洲国家对于震撼整个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可以抱一种超然态度的话,那么现在,每一个亚洲国家的领导人绝对不会对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政治动向不闻不问了。今天,叙以和谈,北约对科索沃的轰炸,美国对阿富汗恐怖分子本·拉丹的通缉都会成为各国报纸上的新闻,成为与这些国家和民族相距数万公里之外人们关心的话题。生活在 20 世纪末的各国人民以及他们的政治家们都不得不将其目光扩展到本国之外。打开国门,吸收全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成果,研究国际关系,重视国际环境,努力寻求发展自己的条件与机会,已成为当代人的一个共识。

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经历了一个孕育产生、初具形态和初步发展的过程。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任务是以单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研究为基础,专门去探究确实是发生在国家之间,但仿佛又超越于、凌驾于每个国家之上的客观的关系,并对这种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神秘复杂的关系的形成、变迁与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作出合理的描述。这种研究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世界上存在着的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有权按自己的目标、条件、实际情况去创造适合自身需要的社会制度、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国家相对说来,人们过着的是一种有组织、有政府的生活,而在国际社会中,人们则是过着一种无组织、无政府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的偶然性、主观随意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

但是国际关系又是不得不研究的领域。因为在现实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事实上已结成系统,没有一个国家会听任其

他国家违背大家公认的规则去为所欲为,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与这一国际整体相隔离的情况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每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就是对国际生活、国际关系加以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主动适应国际关系,并利用这种关系来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

从认识的角度来说,人们对国际关系的了解要落后于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所亲手造就的客观的国际关系现实。人们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则更要落后于国际关系的实践。各国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可以对本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总结、分析和预测;但是,每个国家、民族的现实社会生活研究得再透彻,再清楚,把它们都累加起来也代替不了对国际关系的了解。

对国与国的关系加以详尽的记述,并不等于有了国际关系研究。国与国的关系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狭义的国际关系,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指的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由主权国家或地区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时期表现为某种格局和某种秩序即某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和在一定的结构基础上的国际生活的运行机制与规则。在古代社会中,特别是希腊和中国,由于城邦罗布、小国林立,必然发生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战争,记述诸国之间关系的著作也就产生出来。但由于这些关系仅仅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里,没有出现真正全球范围关系,因此这些著述虽也或多或少涉及到某些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简单论述,但终究算不上是严格意义的研究。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只是在近几十年中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研究领域在发展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或者说它还远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是因为:首先,已经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史的方面,这是国际关系研究发展中的第一步,即将国际关系研究从单纯的历史学科中分离出来。在国际关系研究

的最初阶段上,人们对国际关系的历史表现出巨大的关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历史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将历史学中已经记述的有关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材料加以汇集相对地来说较为容易;二是由于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同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联系在一起,有很多材料是保密的,往往要等到事件过去了很长时间,才能一点一点地向外公布,正是这种资料来源上的局限,也迫使相当多的研究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国际关系历史的分析上。

国际关系史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因为今天的现实是过去现实的延续,今天的国际力量结构是历史上各种权力争斗的结果,可以说,要了解今天国际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不能缺少对其来龙去脉的分析。但是,国际关系研究终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国际关系史的追求,而应当帮助人们认识现存的国际生活和由这种生活所引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预测国际生活未来的走向,促使人们更自觉地参与到这种生活中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因此,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将目光主要瞄准当代,围绕当代的国际关系实践寻找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

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对史料的可靠性提出疑问。因为,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国际关系,在前人那里,它却是现实的。那时有许多当事人的活动可能是相当隐蔽的,没有任何文件保留下来;甚至为了将当事人的活动隐蔽起来而采取故意将事实真相进行歪曲记载的现象。因此,不少人觉得唯一可信的材料只能是各种具有法定形式的文件。这样,在国际关系的研究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法学化时期。国际生活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并以一定的法律依据作为各国领导人的行为规范来运转的。但是制度、法律同真实的国际关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离开了对当时的真实事件的剖析,单凭某些法律的条文是无法对国际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与评价的。

但是国际关系研究也决不是关于时事的汇编。每一个国际关系的研究者都处在大量的国际现象和国际事件的包围之中,这些国际现象的重点在不断转移,跟踪的事件、倾向也在不断地变化。如果人们只是停留在或满足于对事件、对现象的单纯的考证与记录上,甚至有时为了某一个并不太重要的细节而在那里考证不停、争论不休,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五六十年代以后,科学主义、行为主义学派作为对国际关系中单纯历史主义倾向的一种批判,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这同这一时期计算机的广泛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创立和完善是密切相关的。应当说,行为主义将自然科学中的定量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确实弥补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的不足。但是,正如美国学者威廉·福克斯所评价的那样:“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计算机革命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和技术。储存和取出数据的新的方法将为定量研究打开新路。但毫无疑问,这种数据的泛滥所造成的会如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在这一方面,一支削尖的铅笔可能要比一台电脑更为有用。”(威廉·福克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日益突出的问题”。《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南卡罗里纳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01页。)

因此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应当在大量的处在经常变动之中的事件后面,找出一些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些基本的规范、规则,才能成为对当代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件加以评价的标准。只有找到这些基本的规范、规则,人们才能获得坚实的立足点,也才能凭借这种立足点将最近的事件同久远的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因此,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重视的是这种研究所赖以进行的基本理论和基础方法。

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吸取这一学科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它又需要变革和创新。这种变革和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学科知识体系本身的构成与完善上的逻辑规则;另一

方面则是来自现实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对理论所提出的要求,而后一方面的推动力量特别大。

在人类历史上,世纪之交往往是多事之秋。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欧洲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事变:法国爆发的大革命,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同盟与法国在军事上展开反复的较量;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正是这些事件,导致了 19 世纪初世界格局的大变动,孕育了维也纳体系;19 世纪刚迈进其最后的十年时,“铁血宰相”俾斯麦倒台,以玩弄平衡而出名的俾斯麦外交体系解体。德皇威廉二世提出所谓的“世界政策”,不断加强军备;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国也开动了扩军备战的车轮。欧洲两大军事集团最后形成。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开始,接连爆发了英布战争、美西战争、日俄战争,从而引起 20 世纪 20 年代世界格局的改变,孕育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20 世纪也不例外,人类是在一连串的震撼世界的巨大事件接踵而至的动荡与不安中进入这个世纪的最后 10 年的。一系列的的重大事变宣告了从四十五年代就形成的并且在 20 世纪下半叶一直发生作用的雅尔塔体系的终结。这些事件虽然有的已过去三四年或四五年,但是,它们在人们心头造成的余震至今仍然存在着,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政治学家们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些事件作出深刻的分析,已有的著作顶多只是对这些事件进行了记载,究竟这些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发生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其深刻的背景是什么,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现在还没有得出共同的认识。但是,这些大的事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结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生活的运行机制。从 50 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各种有关国际关系的观念已经动摇,甚至崩溃了。世界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它要求人们必须以全新的观念审视一切。

人类是带着对 20 世纪下半叶的冷战对峙格局的批判态度进入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40 多年

中,人类一直生活在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所实行的冷战对峙的格局下。整个世界的政治地图、经济地图、意识形态地图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两极对立的结构。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这种两极对抗的格局首先在政治领域中出现松动。随着柏林墙的拆除、东西德的统一,前苏联分解成一系列的独立国家,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组成的“华约”解散,军事上的特别是核武器试验和制造上的激烈对立最终缓和下来;接着,一些原先纯粹搞计划经济的国家通过不同途径、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直起作用的两种简单对立的模式显露出其固有的局限性。人们在客观的政治与经济生活面前,不得不承认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多元性。意识形态和其他思想文化形态的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不同的文化,以其独特的价值而在不同民族和地区并存着。

这种巨大的转变使人类的生活、历史、观念也随之改变。如果说,在以往数千年文明史上,人类是在“100 次地祈祷和平,带来的却是 1000 次战争”中度过的话,那么,今天,人类有可能在相对长时间的和平中生活了。尽管有人认为,将冷战结束看成是永久和平的到来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世界将进入一种东西方的“冷和平”。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所依据的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的确,莫斯科与华盛顿在经济援助、科索沃危机、北约范围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着深刻分歧。虽然东西方的对抗还没有完全消失,美国和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独立国家之间的间谍战仍旧在进行;虽然,在两极对抗的格局下被掩盖了的或被冲淡了的民族矛盾、种族纠纷、宗教冲突现在又纷纷冒出来,而且地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在兴风作浪;各种矛盾所引起的震动、动荡、冲突以及经济衰退的阴影正在严重地困扰着这个世界,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作为旧格局的残余而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它们会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的进程产生一定影响,但却不可能改变人类历史的根本趋势。人类对和平、稳

定、发展不懈的追求正在给这个星球带来希望。正是这一根本性变化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内容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冷战结束以后,政治的领域似乎缩小了。军事、政治的冷战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经济、文化的“热战”。因此,当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集中在某些传统的领域,而是向更广泛的范围、更深入的层次发展。从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研究的实际进展情况来看,尽管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仍旧是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以及政治学家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人们还是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全球的和地区的安全、核武器的研制与扩散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但是,与国际生活相比较,国际经济生活似乎更为重要。而且,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走到了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这一步,能将各种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的参量,除了政治制度外,就是文化。因此国际文化生活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当今世界上,衡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决不像四五十年以前那样只要看一看它拥有多少枚地对空导弹、多少辆重型坦克、多少艘航空母舰、多少架性能优良的战斗机就行了。现在人们不再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与军事、武器有关的方面,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优先考虑经济增长的速度、社会的稳定、国民素质和士气、文化价值和外交质量。这就决定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研究至少应当将国际政治关系、国际关系的研究更加系统化。

在 90 年代前半期的发展中,亚太地区显示出较强的活力。相对稳定的政局、高速增长的经济、迅速扩大的投资、积极活跃的贸易、不断展开的区域合作,使这一地区成为当代世界最令人瞩目的地方。中国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一员。经过 20 年的改革开放,一个和平、安定、繁荣、发展的中国正在世界的东方崛起。这是本世纪的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人们已经对中国刮目相看,重新估

量它的份量,并在议论中国将在当代国际上可能起到的作用。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中国前景美好是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佳的经济消息;日本的《读卖新闻》则将中国称之为“觉醒的雄狮”;美国的《商业周刊》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个经济巨人的崛起。这些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在西方经济正陷入持续衰退的时候,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潜力正在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这种特殊的机遇对提高全民族理解、关心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意识,从而为在中国开展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创造了条件。我们应当勤恳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科学的、相对独立的、适应时代要求的当代国际关系学科。

前 言

自从系统论的研究方法被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后，作为政治学的一部分——国际政治学（更宏观的政治学）也很快出现了有关的系统理论。芝加哥大学可以说是这种政治系统理论研究的发源地。在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统》（Political System, 1953）出版不久，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政治学教授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推出了《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57 年）。从此，“国际体系”一词在 60 - 70 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中逐步变得时髦起来，各种关于国际体系的论著在西方层出不穷。几乎所有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都带有系统研究的特点，最出名的要算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 1979 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l. Politics）。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的话，这本书或许是二战后继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那本《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之后，西方国家国际政治理论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一本现实主义理论著作。然而，就是这本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著作也在

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正是在学者们对沃尔兹这部不厚的著作进行的争论中，我发现了作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者在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研究中应该吸取的东西——历史唯物论的研究方法。应该承认，我这本书的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受启示于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的“物质、意识和制度”分析法。此外，另外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一些依附理论家的著作^①，也给了我学术上的许多启示。

英国学者海德利·布尔（Hedley Bull）曾说，国际体系在于国家间有足够的联系和彼此的影响，进而一国的行为成为它国行为考量的因素；国际社会是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国家组成的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它们受到共同的规则影响，共生于一种共同的运作机制中。^② 这里我只引用布尔的定义，没有采纳他书中所说的利益与价值观（本书中的价值观和利益观更多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讲的）。由于世界主要国家在共同价值观和利益观上不总是一致的（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有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主要国家并不共存于同一联系的机制中（如苏联和中国长期游离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制之外），因此，本书仍采用国际体系为书名，但也兼顾到国际社会研究的内容。

从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各国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种天生就要面向世界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几次重要的

① 这些著作，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霍布斯鲍姆的革命三部曲《革命年代》、《资本年代》、《帝国年代》以及《极端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999）。Peter Ever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eotonio Dos Santos,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V 60, PP231 - 236.

②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2nd ed.), P9, P13.

工业和科技革命)，逐步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这种体系最初只在欧洲（加上它的殖民地），后来由于工业和科技革命逐步扩展到整个世界（在 19 世纪末），并且以后进一步向深度与广度发展，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全球化就是这种发展的当今体现。

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物质财富成为世界自近代以来最有权力的社会力量。他们首先在国内结束了君主的封建专制统治（因为专制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了资本的自由竞争，捞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开始艰难地建立起民主政体；然后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扩展资本主义，消灭或企图消灭与资本自由竞争不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欧洲专制时代（Age of Absolutism）统治结构，逐步建立起自由国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金本位制加英国的海上霸权与欧洲均势平衡者的角色）。在这种体制背后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强调机会平等下的资本自由竞争。但随着民主的发展，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工业大生产中产生的另一种社会力量进行妥协，这种妥协的结果是经济上和政治上扩张的民族主义（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大泛滥，企图通过对外扩张来缓和国内的矛盾与冲突，结果导致了维系自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两大支柱（金本位制和欧洲均势）受到破坏，出现了人类空前的大浩劫（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大萧条）和反自由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

二战后，自由资本主义国际体制得以重建。但这种重建的体制是一种民主自由的国际资本主义体制（向工人的社会民主要求进行了妥协，有人称它为“妥协的自由主义”^①），而且这种体制不

① Ruggie, John Gerard.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y ord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 36, PP379 - 415, 1982.

适用于苏联式社会主义阵营（按布尔的定义，这时世界应是两种国际社会，这两种国际社会都试图以某种方式来消灭或限制对方）。这种体制在经济上是布雷顿森林体制、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它们所体现的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公平的自由主义），政治上通过所谓的“国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tate）实现了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①，共同对苏联式社会主义进行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遏制”。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核相互确保摧毁”机制，维持着世界的大致稳定。由于美苏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双方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都出现了政治经济的危机。但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革相对成功了，通过化解国内民主的压力，再次突出了资本的效率和自由，从而再一次发展了生产力（新科技革命）；在苏联改革受到重大挫折、发生解体与巨变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再一次大发展的前期。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原来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体系的国家也逐步地加入进来，^②而且这时民主自由资本主义处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的鼎盛时期。因此，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美国，要利用这种市场关系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来改造世界，建立由威尔逊提出的、经罗斯福重新设计的（但由于冷战没有完全实现）世界性的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在政治上，美国在世界大力推行以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民主价值观；经济上，力求在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①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l. Relations Theory", in Keohane, Robert O.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230 - 232, 1986.

^② 中国与东欧与俄罗斯不一样，按邓小平的思想，中国这样做是利用世界市场发展自己，发展社会主义，哪怕暂时让人赚钱也是必要的；其实这也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因为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战胜不了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3卷第10页）

但这种民主自由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它以经济上的不均衡为代价，而政治民主恰好要求的是平等。尤其是向非发达（也是非西方文明）国家移植时，会产生一种反西方的倾向或者是变形的民主，所以，亨廷顿认为这是“土壤”不对，因而会导致“文明的冲突”。其实，非发达（非西方）文明国家因为其能力太弱，在现存的世界自由竞争体制下是无法与发达国家进行“公平竞争”的，因而其国内绝大部分的社会力量都会要求国家作为堡垒来保护其竞争的弱势（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如美国与德国在19世纪都是这样干的），这是发达国家的社会力量与非发达国家社会力量的利益之争，而不是“文明的冲突”。这种改造世界的后果，还可能导致一些非世界经济的中心大国，如中俄，由于意识形态与势力范围等因素与美国产生矛盾，甚至可能是冲突。作为世界经济的非中心结构成员，中俄两国由于经济上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必然在政治上受到中心结构的排斥甚至是压制。这种排斥或压制可能会导致中心结构之外的大国产生强烈的民族愤怒感。

因此，在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国家与国家社会力量间的关系。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即中心结构中的统治力量），只要可能总是要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 and 精神的改造。因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 主宰物质生产过程的资产阶级必定要利用其物质上的优势来对世界进行统治，靠建立某种体现其利益意识和制度来保证这种统治，不论国内还是国际，都是这样，只是国际上这种现象不像国内直观明显而已。拿破仑是第一个对世界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人物，以后是威尔逊（但美国的孤立主义的历史惯性束缚了他的手脚），再后是罗斯福（他的设想由于冷战没有实现），现在是克林顿和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莱尔等人。在某种国际体系内,不符合这种制度要求的国家将受到各种打压。资产阶级在取得世界主导权之前也是受到这样的“待遇”。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就受到了欧洲所有君主国家的联合干预,因为大革命体现出来的原则与“王朝正统”原则格格不入。苏联“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也遭到了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的干预,因为革命政权体现出来的意识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因此,在国家这个层次上,各个国家的利益决不是抽象的,是由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决定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目标也不是像沃尔兹所说是相同的,国家的属性可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不计的,国家间关系只是抽象的权力斗争关系。^① 权力关系成了解释国际政治唯一的变量。所以,国家的对外政策既受国内因素的影响,也受国际体系的制约;既由国内主导的社会力量决定,也受到来自国际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力量的限制;国内的主导意识与制度同国际流行的意识和制度是否产生矛盾,主要取决于国内和国际各主导社会力量的矛盾关系。

最后,我必须申明:本书中用社会力量、意识和制度的冲突来分析国际关系,并不表明作者是斗争学说的倡导者。有时妥协更直接地推动历史发展,妥协比起革命来更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这也是符合历史唯物论的。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历史唯物论的国际体系研究方法是一种比西方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也可称自由主义或理性主义)更好的研究方法。好的历史唯物论的国际关系研究并不排斥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理论中好的因素,如权力和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把它们结合起来。因为在现实中,国际关系本身就不是一种因素——权力因素决定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冷战,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美国的对外政策。

^①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关系理论》,第110—115页,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